

Wenxue Yanyu Xingwei Lun
yanjiu

文学言语行为论 研究

张瑜 著

学林出版社

文学言语行为论 研究

张瑜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 / 张瑜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80730 - 844 - 7

I. 文… II. 张… III. 文学语言—言语行为—研究
IV. I 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9114 号

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



作 者——张 瑜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9.25

字 数——23 万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844 - 7/H · 65

定 价——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赵宪章

张瑜博士一直在文学和语言的结合部位努力探索，本研究是他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许多学者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像他这样在同一领域持之以恒，不断开掘，且能新见迭出，实属罕见而不易。文学和语言、文学理论和语言理论分属于不同学科，用一句时尚的术语来说，本研究也算是“跨学科”了。

学科的逐步细分本是学术进化的必然，没料到却成了当下世人诟病的对象。于是乎，“跨学科”、“跨文化”成了最招摇的学术旗帜，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成了学界最时尚的口号。这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跨学科是手段而非目的，不能为“跨”而跨，也不能为时尚而跨；所谓“跨”，也要顺其自然，一步一步地跨来，不能任意所为，一步跨到天边外，最后竟然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例如文学研究，和其最为邻近的当是语言学，文学研究的跨学科首先“跨”到语言领域，才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在“跨学科”的旗帜下，文学研究更多的跨到思想史、文化学等遥远的领域去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这也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如果最为邻近的这一步尚未跨过去，就去跨越第二步、第三步……，即



使并非痴心妄想,也只能跨出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来,和文学本身的关系并不紧密。例如常被学界所议论的文艺学,就其学科性质来说本应着力于文学理论,但其现状却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有些冠以文艺学名义的研究其实和文学没有多少关系,成了远离文学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我们的窘境,也是“跨学科”的误区。

在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培养目录中,“文艺学”作为二级学科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和文艺学并列的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并列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等等。“语言”和“文学”就是这样被捆绑在一起,说明它们是最为邻近的两个学术领域。这既是当代中国最高学术领导机构的权威表述,实际也是中外学术史上的规定,例如所谓“语文”(language and literature)概念,以及用它所命名的各语种的启蒙教育课程等,就是它们的身份及其密切关系的证明。换言之,“文学”和“语言”本为一家,或者说是最为邻近的两家,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整个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毫无疑问应把语言和语言学作为首要选项。而实际上呢?我们的文学研究对于语言和语言学多有漠视和疏离。最为亲近的邻居未被充分关注,反而“跨”到了八竿子打不到的非文学领域,这种无视学术自律的“跨学科”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文学研究将语言学作为最为亲近的友邦并非笔者的发现。纵观整个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大凡以文学本身为目的理论批评无不如此。早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就已经确立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文学观,此后的修辞理论、诗画理论、文体理论,特别是20世纪西方的文学本体理论、叙事理论等,无不如此。中国的文论史也是这样。例如刘勰,尽管他信奉儒家诗教,但其《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幅是用来讨论和诗语相关的问题;且不说我国古代关于遣词造句、谋篇布

局、诗词格律和文类风格等方面的论述，更是洋洋大观。总之，关注语言就是关注文学本身，就是以文学本身为目的文学研究；否则，所谓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只不过是招摇的旗号，实际上有着另外的图谋，例如近年来关于文学之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吵，和文学本身就没有太多的关系。

将文学归纳为某种“意识形态”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文学确实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是，文学同样具有非意识形态性，甚至和潜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这样，将文学定义为某种意识形态有什么意义呢？退一步说，文学是否属于某种意识形态，对于文学本身有什么意义呢？大凡没有意义的东西就是伪命题。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引发那么大的风波呢？看来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场所谓的“学术争鸣”并非纯粹的学术本身，在它的背后可能有着难以言说的隐情，即其另外的图谋——非文学的图谋。所谓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过是关于文学的非文学命题，是以非文学的身份对文学的强力而已，和文学本身的知识域无关。这种“强力”就在于无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基本常识；即使贴上了这一标签，在学理逻辑上也难做到自然而然，“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沟壑与斧痕显而易见。可见，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很难跨越“语言”本身，跨越语言的所谓“文学理论”很难“跨”出文学的真知。文学和语言，就是这样须臾不可分离。

总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一个朴实无华的真理，无论后人和国人如何折腾文学的定义，或将其意识形态化，亚氏所确立的这一观念不可能被彻底颠覆。即使那些“审美意识形态”派，也还是想守住“语言”这块看家的牌匾，只不过他们的文学定义并未获得学理逻辑的支持。事实说明，“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同时也是它的本体存在；



因此,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这应当是其“扩容”、“突围”或曰“跨学科”的边界和底线,一切远离语言本体的“高空作业”不过是文学名义下的花拳绣腿。因为,文学语言不同于一般语言,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艺术化了的语言。纵观20世纪文学研究的形式理论,说到底就是关于语言被艺术化的美学理论。语言的艺术化也就是形式化,即把实用的语言转换成非实用的艺术形式,语言作为实指符号演化为非实在的艺术符号。

张瑜博士的研究意义也在这里,他所关注的主题就在语言和文学之间。更重要的是,他的独到之处并非一般地讨论两者的关系,而是阐发了现代语言学的另一支脉——言语行为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关系。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不同,以奥斯汀、塞尔等人为代表的言语行为理论发现了语言的“施为性”,认为“言就是行”,言说就是行事。这一观念,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的文学理论,例如文学反映论、审美实践论等,很有启发意义。如果能够参照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作为“反映”和“实践”的本体,至少可以规避理论本身的空泛,有效地缩短和文学本身的距离。道理很简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张瑜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受业于王元骧教授,毕业后又投奔朱立元教授的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王元骧教授是我国文学反映论的主要阐释者,朱立元教授是实践论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张瑜博士的研究选题无疑从王、朱二位教授那里获取了启迪和灵感。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相信张瑜会有更好的发展。

是为序。

2009年初春

CONTENTS | 目录

导论 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理论	1
一、语言论文论发展的两条路径	1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思想和特征	6
三、文学言语行为论在西方	12
四、文学言语行为论在中国	19
五、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意义	25
第一章 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语言研究	34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语言观：施为性功能	35
1. 语言施为性功能的发现和提出	35
2. 施为性功能的条件	41
3. 施为性功能的特征和意义	44
二、奥斯汀的“难题”	51
1. “准言语行为”	54
2. 模仿的言语行为	57
三、文学语言具有施为性功能	64
1. 文学话语施为性功能的体现之一——创造性或建构性	65
2. 文学话语施为性功能的体现之二——交往性	73
3. 解构主义的批评：重复性与引用性	81



4. 言语行为理论的文学语言观	89
四、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	95
1. 文学：以词做事——创造与交往	95
2. 文学：以言行事——影响和改变现实	107
 第二章 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意义研究	115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语言意义观：行为论意义观	116
1. 三个层面与两个视角	116
2. 语力与意义	120
3. 交往意义与意向、语境	126
4. 解构主义的挑战：意义的不确定性	132
二、言语行为的文学意义观	137
1. 当前文学意义研究的现状与言语行为文学意义观的定位	137
2. 文学意义的构成	141
3. 文学力量与文学语力	149
4. “言外之意”	157
三、言语行为文学意义的分析模式	162
1. 言语行为的文本观	162
2. “言语双重结构”分析	166
3. 文本交往层次分析	176
 第三章 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观念研究	192
一、文学研究的“实践转向”	193
1. 国内文学研究“实践论转向”的表现	193
2. 西方文学研究“实践论转向”的表现	196

3. 文学研究实践论转向的原因及文学言语行为论的优势	201
二、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新型的话语实践论文学观	208
1. 实践范畴的含义和话语(言语)交往实践	209
2. 文学言语行为论的实践论文学观的逻辑起点：人还是语言	216
3. 文学言语行为论的实践论文学观的主要思想、特征和思维方式	223
4. 从言语行为角度看实践论文学观与反映论文学观、形式主义文学观的关系	231
三、如何在具体的阅读中把握文学言行论的实践论文学观	243
1. 以巴尔扎克的小说《永别》为例	243
2. 现实主义与解构主义的解读	245
3. 文学言行论的话语实践论解读	250
结语 文学言语行为论：一种新型的话语实践论文学观	260
参考文献	266
后记	279

导 论

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理论

一、语言论文论发展的两条路径

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给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了重大的变革,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基础之上的一系列语言论文论^①流派的异军突起成为文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们从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语言入手,对文学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和阐释,建立起以形式、结构、符号、文本、细读等范畴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与阅读范式,在文学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中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学科的形成和成熟。

通常,国内文论界讨论语言论文论只涉及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这四大文论,并以“形式主义文论”概括和标示。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因为这不仅忽略了 20

^① 本文将 20 世纪以来从文学语言入手,采用现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理论来构建的文论各派都统称为语言论文论,而不采用形式主义文论的传统叫法,这是考虑到语言论文论在 20 世纪有个发展过程,后期语言论文论各派都以突破形式主义为目标,理论观点与形式主义的大相径庭,难以统一到形式主义旗下。另外称语言论文论而不是语言学文论,是因为诸派所采用的理论资源不仅来自现代语言学理论,也来自语言哲学理论。



世纪最后 30 年语言论文论一些重要派别的活动，而且也忽视了语言论文论自身的发展存在的内在变化。实际上，20 世纪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具体分为前后两个兴趣不同的阶段，借用索绪尔的术语来概括，即以“语言”为中心的研究阶段和以“言语”为中心的研究阶段。前者以研究抽象的语言自身形式结构特征为中心，后者则以考察现实环境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特征为中心。两者对文学研究领域都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前者直接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五大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后者则产生了以巴赫金的言谈对话理论、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批评所形成的三大代表性的文论。^①因此，可以看出，语言论文论的发展不仅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而且在内容上也存在着“向内转”和“向外转”两条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这两条线索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前后逻辑上的承继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语言论文论的整体格局。

“向内转”的语言论文论在 20 世纪之初首先登上历史舞台，其发展横贯大半个世纪，从俄国到捷克布拉格，再到法国，又波及到美国，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这五大文论吸收了现代语言学革命成果和 20 世纪之初的语言哲学的成果，将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都置于语言学平台上加以讨论和处理，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使文学研究切近了文学，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封闭使文学远离了社会生活。前者是因为“语言学转向”的时代潮流中，人们普遍认识到文学作品首先是由语言构成的，对语言性质与功能的理解会影响甚至决定对文

^① 20 世纪的语言论文论派别较多，除了这里所举的重要派别外，前期还有英国克莱夫·贝尔的形式研究、瑞士凯塞尔的语言形式主义研究，后期还有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塔尔图符号学派等等。我们这里只列举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文论流派。

学性质和功能的理解的观点，因此从语言学平台上讨论和解决文学问题成为最切近文学的研究途径；而后者则如保罗·德·曼所指出的，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一个自我指涉的唯我论式的形式概念”，^①这种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足性的观点，造成文本内在（形式主义）与外在（社会的、历史的）的两极对立，导致文学与社会生活实践的直接联系被割裂了。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其采用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理论，^②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最革命之处就是把语言当作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加以“共时性”的研究，强调语言符号的自治。这一思路对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非凡的影响，上述各派在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系统特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极富有成效工作同时，也促使了文学理论批评向“内”转，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形式结构系统，强调文学意义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系统内部的结构，于是必然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广泛联系，造成文本内外的两极对立。因而在西方语言论文论盛行的时代，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被长久的忽视和悬置。

但是文学毕竟不是一种可以隔绝人类社会生活的自在自为发展的“物品”或“系统”，文学语言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文学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和互动是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论题。前期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在一种“理想的”、封闭的状态下考察文学语言和文学，这种理想状态

^① See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

^② 欧陆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都明确承认和接受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影响，而英美新批评与索绪尔的语言学关系较为复杂，表面上新批评接受的语言学影响主要是语义学和语境理论，与索绪尔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汪正龙的研究表明，瑞恰兹、韦勒克等人对索绪尔的语言学作过批评和肯定，表明新批评的学术理念仍然间接受到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参见汪正龙《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下的研究所带有的封闭的缺陷必然会引起广泛的质疑和批评,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和兴趣的转变,语言论文论内部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就是从“向内转”走向了“向外转”,由形式主义走向功能主义研究,由文学(语言)自身的研究走向文学(语言)与外界的关系研究。语言论文论的这一重大变化直接导致了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又一重大的转移,希利斯·米勒对此曾有一个堪称经典的概括,他说:“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在的’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他并指出了这种转向的原因正是由于语言研究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这种转移从对‘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其关心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联系。”^①这正是后期语言论文论发展的重点问题,即力图突破前期语言论文论的形式主义的封闭和狭隘,把文学、文学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直接联系起来。在这方面,20世纪后期崛起的巴赫金的言谈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哲学、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为后期语言论文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这三大理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恢复和重建了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历史的密切联系,对文学研究和语言论文论的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俄国文论家巴赫金自20年代起就针对形式主义的缺陷提出批评,并由此提出了言谈对话理论、超语言哲学等一系列“向外转”的理论,但其命运不济,雪藏了半个世纪后才重新被发现。巴赫金的言谈理论的主要视点是“对话—主体间性”,巴赫金强调“对话交际才

^①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①，话语的意义来自主体间不断的对话。从巴赫金言谈理论的对话原则出发，必然要突破形式自足的语言论文论观念，强调文学的意义不是文本内部封闭自足的产物，而是作家与读者、批评家平等对话的产物。巴赫金的理论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和我国文论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欧陆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是从结构主义理论中孕育出的反叛理论，特别是福柯的话语理论，突显了“向外转”的发展趋势，福柯话语理论的主要关注的是“话语—权力”关系，它强调话语与权力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权力制约着话语，话语反过来也巩固权力。^②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必然会启发人们突破形式主义的封闭范围，探讨文学话语、文学与现实生活中权力的种种联系。我们看到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批评流派在这一方面已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英美言语行为理论，最初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格莱斯等人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它与话语理论、言谈理论不同的视点是“言语—行为”，即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功能和特征。言语行为理论最有价值和最为革命的贡献是发现和提出了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一种重要的“实施行为”(performative)的功能，并强调指出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传统认为的反映和描述功能，而是这种“施为性”功能，由此言语行为论把说与做、言与行统一起来，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行为。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也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它不只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描述，更重要的是文学是一种以词做事的施为性实践活动，它能够以一种特殊使用语言的

^①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年，第 252 页。

^② See M. Foucault,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Adams, H & L.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49.



行为方式直接介入人类现实生活，参与构建和创造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

上述“向外转”的三大语言论文论中，前两种已经被引进和介绍到我国文论界，并被广泛运用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中，而来自英美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我国文艺学界还是陌生的，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实践性的重要特征还没有引起我国文艺学界的普遍重视。本文选择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论题，写作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引进一种新理论，也不是要对英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做全面总结和述评，而是认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实践性特征和观点对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的实践性观点考察文学语言和文学有可能促使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学实践论，真正超越传统主流的反映论文学观以及20世纪影响深远的形式主义文学观，推动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向前发展。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思想和特征

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思想是“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即人们在说话时不仅仅只在说话，同时也在做事，是通过说话在做事，即以言行事、言中有行。例如某位领导人在某个庆典大会上宣布：“我宣布××大会现在开幕！”他不仅是说出这句话，同时也在做“宣布”这件事。用术语说，他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也做了“宣布”这个施事行为，他的话具有“宣布”语力。这个观点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把言与行，说话与做事看作是分离或对立的习惯看法完全不同。实际上只要人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以言行事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人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用语言做事，“对不起！”在大街上不

小心踩到别人脚时,你通过说这句话完成了一个道歉的行为,“我答应明天七点钟到你那里”,你在通过说话完成一个许诺行为,以言行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一种语言功能,但是最深刻的往往是最简单的,也往往最被人所忽略。直到20世纪,才有人类学家和不少现象学哲学家注意和论述这一现象。^①但是明确提出,最为系统论述这一现象的则是英美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和他的学生塞尔。

1955年,奥斯汀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发表讲演,在这次题为“怎样用词做事”的系列讲座上,他提出了语言也是一种行为,说话就是做事,言就是行的新思想。这一思想立刻受到普遍的关注,并迅速冲出哲学界,对语言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经他的门生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等人的系统阐释和发展,这一思想被正式定名为“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代语言哲学和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②

与本文文学论题相关,言语行为理论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我认为颇值得一提:

^① 例如人类学家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现象学哲学家有布伦塔诺、胡塞尔、马蒂、莱纳赫和道伯特等人都注意到并论述言中有行的现象。参见顾曰国《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心智哲学》有关介绍,《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2期。

^② 言语行为理论虽是语言哲学的一种理论。但是对语用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语用学已经被公认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考察这个学科名词,可以发现,“语用”或“语用学”译自英语的 pragmatics 一词,它是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1937年仿效实用主义概念 Pragmatism 自造的。因此语用学概念是从实用主义那里借用来的,它在概念、方法和立场上,都与注重“行为”和“实效”的实用主义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语用学和实用主义在词源上都出自“Pragma-”,这个拉丁词根具有“做、施行、行为”的意思。所以,从广义上看,pragmatics 是指对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所做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把它直译为“言语施行论”或“行为学”。由此可以看到言语行为理论与它的密切联系以及言语行为论何以成为语用学的核心理论。而人们现在已经常用的“语用学”一词只是对 pragmatics 这个词的狭义理解,是把 pragmatics 这个词置于语言研究这个特定的范围内所做的理解。莫里斯最初使用这个词是与语形学和语义学相对应,把它们当作符号(指示)学的三个分支,此时用语用学就较为合适。参见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的介绍,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